

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农业种植遗存

Remains of Xiongnu Agricultural Planting in Mongolia and Transbaikal Region

王峰^{*}
(WANG Feng)

摘要

游牧自身具有的移动性和季节性强的特点使其无法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生计手段，匈奴将以谷物种植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作为辅助性生计，以蒙古国诺音乌拉苏祖克特墓地、高勒毛都墓地、额金高勒遗址群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伊沃尔加古城为代表的考古资料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匈奴农业发展的面貌。匈奴人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资源来种植谷物并食用谷物，以克服游牧经济天然存在的脆弱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种群的易分裂性。

关键词：匈奴、农业、蒙古、外贝加尔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mobility and seasonality of nomadic herding itself,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become a self-sufficient means of livelihood, the Xiongnu took agriculture, with grain cultivation as the main component, as a supplementary livelihood.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represented by the Noin Ula Suzukteh cemetery, the Mod Gol cemetery, the ruins of Egiin Gol in Mongolia, and the ancient city of Ivorga in the Trans-Baikal region of Russia, have comprehensively reveale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Xiongnu. The Xiongnu made full use of natural conditions and resources to cultivate and consume grains to overcome the natural vulnerability of a nomadic economy and the resulting fragmentation of populations.

Keywords: Xiongnu, Agriculture, Mongolia, the Trans-Baikal region of Russia

^{*} 王峰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研究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13561211703@163.com

前言

作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匈奴虽然以“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著称，（司马迁1959：2879）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在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的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003：167）以谷物种植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同样是匈奴的重要生业形态之一。

笔者目力所及，中国学界对于匈奴农业的研究始于林幹，他在1988年发表的〈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的我见〉一文中指出，“匈奴人之有农业，不仅见于文献，而且见于出土文物”。（林幹1988：3）林文是中国学界最早承认匈奴存在农耕的成果，其提及的“文献”主要是《史记》和《汉书》，而“出土文物”则主要来自20世纪20-60年前苏联和蒙古学者所发掘的诺音乌拉匈奴墓葬。（Nicola Di Cosmo, 1994）乌恩以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发现的众多匈奴聚落遗址为依据，尤其通过对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建筑群及在其中发现的大量农耕物证的关注，指出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等地的匈奴的确存在农业，不过这些地区只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匈奴帝国扩张时期才被纳入匈奴帝国的版图，此前在此居住的居民早就从事农业生产，又有很多汉人来此并带来了更先进的农耕技术，因此不宜对匈奴农业的发展水平评价过高。（乌恩，1990）

其实，乌恩探讨匈奴农业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对匈奴定居生活的研究，而这一点同样也是后来的中国学者们继续探讨匈奴农业问题的出发点，如马利清对于匈奴城址和城塞的研究，（马利清，2002；马利清，2013）王海、王兴锋和刘壮壮对于匈奴城居、邑居生活方式等的研究，均提及了匈奴农业的发展情况，认为匈奴的农业发展较为发达。（王海，2014；王兴锋，2021；刘壮壮，2023）

欧美学界的研究同样是在对匈奴定居生活的关注中探讨了其农业发展情况。达维多娃（Davydova）认为匈奴土地上的加固农业定居点在匈奴人骑马游牧之前就已存在，并在匈奴开始游牧后继续作为匈奴所需食物的来源而继续存在的本土农业社区，其农业产量足以满足它们的需求。（Davydova, A.V., 1968）林俊雄（Hayashi, Toshio）首先总结了有关匈奴聚落意义和民族构成的争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匈奴通过战争掳掠来的战俘可能有权利和资源建造筑有防御工事的聚落，而贝加尔湖地区的伊沃尔加—戈罗季谢和其他类似的坚固定居点极有可能最初是由匈奴的北方敌人（如丁零人）居住，后来被匈奴人占领，这些定居点和聚落都存在较为发达的农业。（Hayashi, Toshio, 1983）狄宇宙（Di Cosmo）在研究内亚游牧民族经济生活时指出，匈奴统治时期中国以北地区的经济与中亚斯基泰时期的经济类型相似，不同类型的农业（特点是休耕制、犁耕制，以及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地理条件施肥）通常与草原游牧共存，形成一个共生、相互依存的社会经济体系。（Di Cosmo, 1994）

显然，目前学界对于匈奴农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却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相关研究成果均非专门的研究，都只是在研究匈奴定居或城址等问题时有所涉及；第二，相关研究成果所依据的考古资料均为20世纪40-80年获得，科技考古

手段尚未充分应用，“没有进行适当的鉴定、摄影和描述，也没有直接确定谷粒的年代”。（Robert N. Spengler III, 2015）

由于蒙古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是匈奴遗存的主要分布区，（潘玲，2006：61）在这些匈奴遗存中存有匈奴进行农业种植的丰富实物证据，因此笔者拟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以谷物种植为主要关注对象，利用新考古资料，对匈奴的农业发展情况做进一步阐释。

一、蒙古国的考古发现

（一）诺音乌拉苏祖克特墓地

2006、2009、2011、2012年，俄罗斯科学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南阿尔泰考古队和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科学院首席研究员N.V.波罗西玛克（N.V. Polosmak）的领导下，发掘了诺音乌拉的最后—个匈奴墓群——苏祖克特（Suzukteh）墓葬群的四个墓冢M20、M22、M11和M31（图2）。发掘区位于中央省（Tov Province）保尔诺尔县（Bornuur Sum）的诺音乌拉山森林茂密的苏祖克特褶皱北坡，在肯特山脉西部支流内，靠近哈拉高勒河（Khara-gol River）的临时支流，东经106°30'，北纬48°33'，海拔1345米。（N.V. Polosmak, E.S. Bogdanov, D. Tseveendorj 2013：102）

四处墓葬中共发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植物遗骸：一种是北蒙古森林地带常见的松树的球果、树枝和某种桦树的树枝，这类植物遗骸仅发现于M31墓室填土中，球果状况良好，皴裂且没有种子；另一种是谷物，这些谷物的谷粒均位于棺底板所垫的毡毯或毛织物上，呈紧密压实的层状分布，“压实层”中谷物与附着其上被压坏的叶、茎交替出现，四处墓葬的谷物层厚度略有差异，基本都在0.5-1厘米之间（图1），谷物上还夹杂在穗轴中的花序遗存（图2）。（N.V. Polosmak, E.S. Bogdanov, D. Tseveendorj, N. Erdene-Ochir, 200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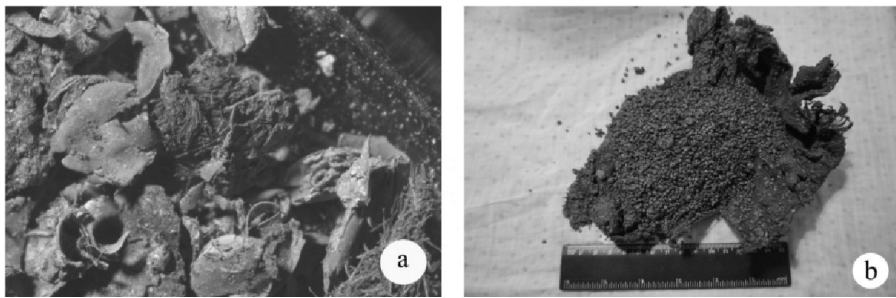


图1：诺音乌拉墓葬完整的谷物压实层：a.M20；b.M22

来源：E. A. Korolyuk, A. A. Krasnikov, N. V. Polosmak, 2018：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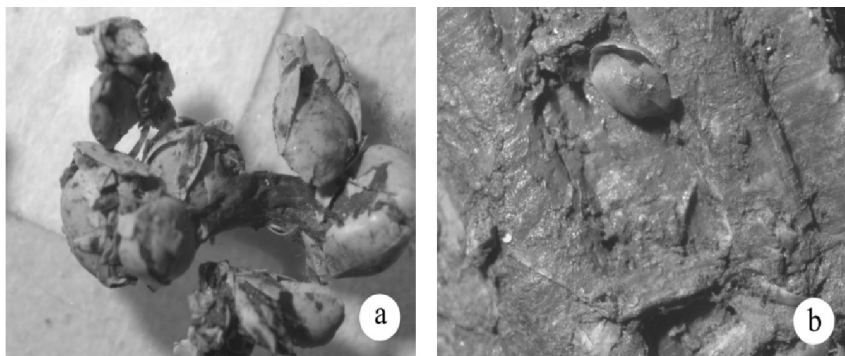


图2：诺音乌拉M20的谷物遗存（a. 仅存的花序；b. 谷物残骸和被破坏的植物部分）

来源：E. A. Korolyuk, A. A. Krasnikov, N. V. Polosmak, 2018, 147

谷物呈深黑色和棕色，保存状况不理想，基本都被压成了畸形（图3），尺寸大概分为两类，一类的长度和宽度分别约为2.89毫米、2.14毫米，另一类的长度和宽度分别约为2.59毫米、1.76毫米。经鉴定，前者为黍，后者为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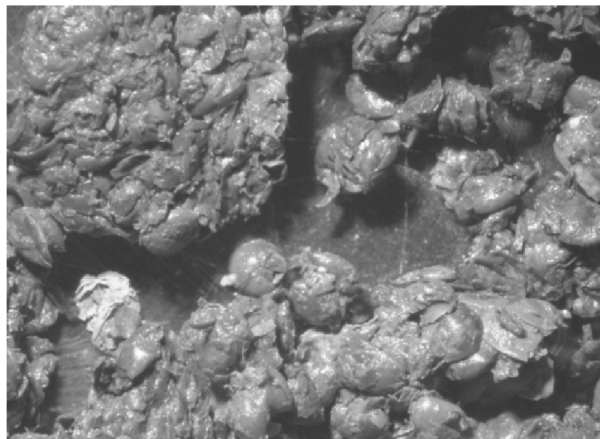


图3：诺音乌拉M20被压制成畸形的谷物

来源：E. A. Korolyuk, N. V. Polosmak, 2010: 58

（二）高勒毛都1号和2号墓地

高勒毛都1号墓地（Gol Mod 1）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海尔汗县东南35公里处，西北距呼努伊河约4公里，墓地东、南、北三面环绕松林，西面为开阔的呼努伊河谷，是规模较大的匈奴贵族墓地之一，2000-2009年蒙古国与法国联合考古队发掘了3座贵族墓和15座陪葬墓，3座贵族墓分别是策·道尔吉苏荣（Ce-Дорджисуронг）未完成的M1及新发掘的M20和M79。M1棺槨的内壁和底座覆盖有朱砂，棺底有一层粘土涂层，涂层上铺有一与诺音乌拉M20相似的毡垫，毡毯上散落着粟；（Andre Guilhem, Desroches Jean-Paul 2002: 198）M20的棺底也有同样的毡毯和粟粒。（Bourret S., Steffen A., 2007: 91）

高勒毛都2号墓地（Gol Mod 2）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温都乌兰县境内，西距哈努伊河（Khanuy River）约12公里，西北距乌日特布拉格（Urtbulag）赫里格苏尔（Khirigsuur）遗址约15公里，属于规模较大的匈奴贵族墓地之一，2017-2019年中蒙两国联合发掘了其中的两座甲字型墓葬M10和M189。M189在清理棺木中部的过程中，棺盖板揭开后可以发现棺内堆积大致可分为三层，每层堆积间用白色织物和毛织物隔开，中有一层为谷粒层（图4），肉眼可见大量的粟、藜类谷壳，经采样鉴定可知：谷物层的主体为带壳的黍粒，其内胚乳及胚已降解消失，仅残留谷壳，谷物层表层绝大部分谷壳被压扁呈片状，呈黄褐色，仅有少数仍能保存原始形态，层内黍粒降解严重，呈黑褐色泥状，测量形态保存较好的黍粒，长2.892毫米，宽2.013毫米；谷物层中还偶见极少量藜的种子，形态均保存较好。种子呈双凸透镜形，黑色，有光泽，直径1.3-1.4毫米（图5）。第三层中也有大量带壳的黍粒和少量的藜（图6）。（蓝万里 2015：252-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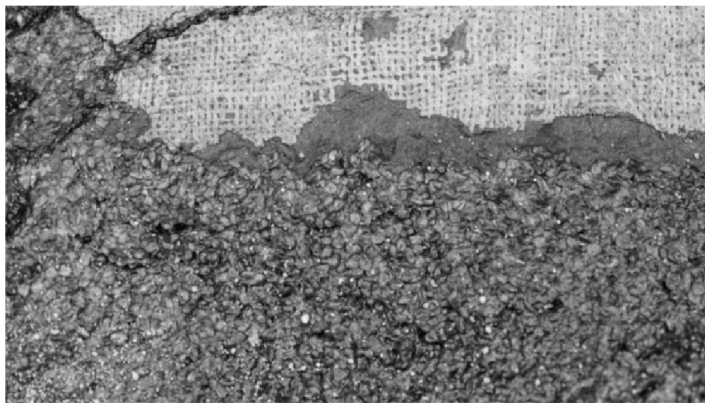


图4：高勒毛都2号墓地M189棺盖板垫层中毛毡和白色丝织物之下的谷物层
来源：蓝万里 2015：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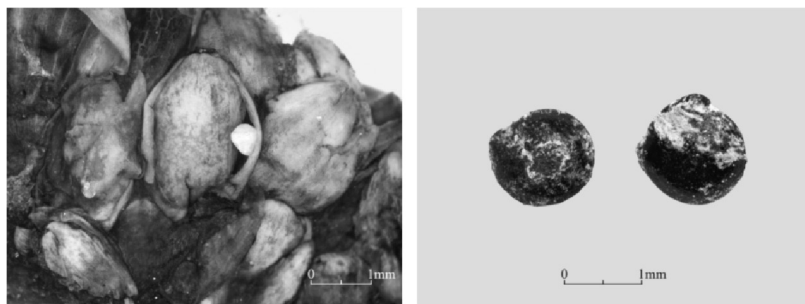


图5：高勒毛都2号墓地M189中形态较完整的黍和藜
来源：蓝万里 2015：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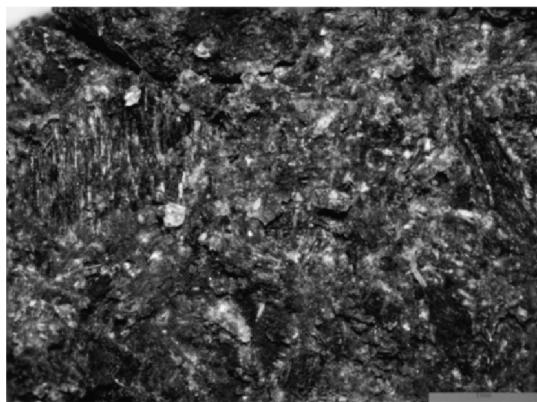


图6：高勒毛都2号墓地M189棺盖板垫层的第三层

来源：蓝万里 2015： 254

由诺音乌拉墓地和高勒毛都墓地的情况可知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棺槨中铺设谷物层的现象并非个例，所不同的是，高勒毛都2号墓地M189选用的谷物是黍，而其他匈奴墓葬选用的谷物则是粟。类似的随葬方式，有别于一般将粮食种子盛放于容器中的做法，俄国学者认为粟或黍在这里的角色不是食物，而是有特殊的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内涵应该来源于以农业为主要生业模式的汉代中国。（Korolyuk E. A., Polosmak N. V, 2010： 60）

在科技考古方面，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发掘者还对来自M1、M10和M189三座甲字形墓葬和分属于这三座墓葬的12座陪葬墓，以及位于布尔干省的Ereen Hailaas墓地和位于库苏古尔省的Salkhitiin Am墓地的人骨遗存开展了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图7），结果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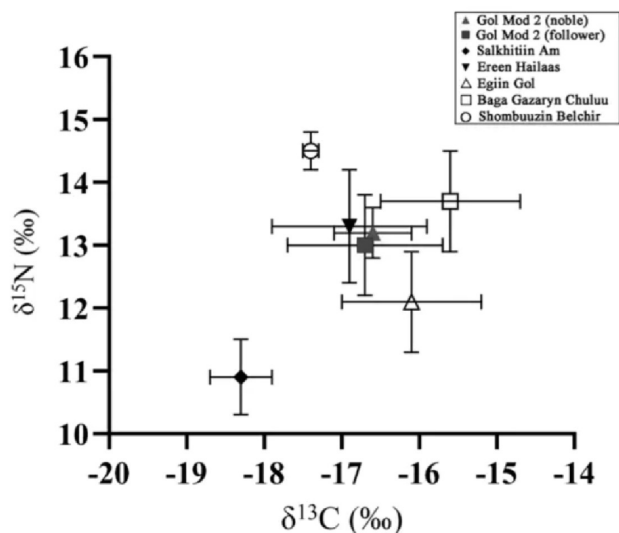


图7：蒙古国境内不同匈奴遗址人群稳定同位素比值对比

来源：Ligang Zhou, Enkhbayar Mijiddorj, Diimaajav Erdenebaatar, Wanli Lan, Bin Liu, Tumur-Ochir Iderkhantai, Sodnom Ulziiibayar, Baatar Galbadrakh, 2022: 888

第一，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贵族和陪葬者碳同位素比值都在-16‰左右，呈现明显的C3和C4混合特征，说明C4类农产品（主要是粟类）在他们的食谱中占有一定比重，而两个不同阶层人群的稳定碳氮同位素比值十分相近，说明他们的食谱特征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Ereen Hailaas墓地的匈奴平民个体稳定碳氮同位素比值与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贵族和陪葬者群体都十分接近，二者又均与此前已发表的额金高勒、Baga Gazaryn Chuluu、Shombuuzin Belchir等遗址匈奴平民群体的稳定碳氮同位素特征十分接近，这充分说明这些人群的食谱结构确实比较接近，并没有因为地区或者人群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第三，Salkhitiin Am群体的碳氮同位素比值（ $\delta^{13}\text{C}=-18.3\pm0.4\text{‰}$ ， $\delta^{15}\text{N}=10.9\pm0.6\text{‰}$ ）要明显低于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贵族和陪葬者群体、Ereen Hailaas墓地的匈奴平民个体，表明这个群体的食谱中C4农产品比重和动物产品的比重要明显低于其他，尤其是其氮同位素比值在已经分析过的蒙古境内匈奴人群中属于最低，甚至接近同时期中国中原地区农业人群的水平。（Ligang Zhou, Enkhbayar Mijiddorj, Diimaajav Erdenebaatar, Wanli Lan, Bin Liu, Tumur-Ochir Iderkhangai, Sodnom Ulziibayar, Baatar Galbadrakh, 2022: 887-888）

（三）额金高勒遗址群

额金高勒（Egiin Gol）遗址群在蒙古国布尔干省境内，位于额金河汇入色楞格河的下额金河谷（the Egiin Gol Vally）处，东南距离乌拉巴托约300公里。该遗址群遗迹丰富，包括墓地、聚落址以及少数不属于这两类的遗址（图8）。1996年至2000年间，法国、美国和蒙古的考古人员对该河谷的布尔汗陶勒盖（Burkhan Tolgoi）墓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共发掘97座墓葬，发现了独特的匈奴陶瓷、金属制品以及羊、牛和马的骨骼残骸等遗物。此外，考古人员还对该地进行了密集的全覆盖调查，发现了有陶器散落的匈奴人聚落址15处，面积从几平方米到4公顷不等，其中7处超过1公顷，主要分布在额金河主河谷的河道北侧的低矮阶地上。（Wright, J., Honeychurch, W. & Amartuvshin, C. 2009: 374）

EGS110聚落址位于布尔汗陶勒盖悬崖下的低河阶地上，是下额金河谷地区最早的大型匈奴人居住地。发掘过程中在一个浅炉灶的炉膛中发现了数枚碳化的麦粒，经鉴定为小麦，且其中一粒的直接年代为距今2330-2150年，为秦至西汉时期。EGS486聚落址位于额金高勒现洪泛平原之上的一小块古代河流阶地的边缘，是额金高勒遗址群中唯一拥有大量定居点基础设施痕迹的聚落址，在对该聚落址小规模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与伊沃尔加城居住区的坑十分相似的“沟状”垃圾坑，从中发掘出了三类古植物的炭化遗迹，一是几种当地树木的木炭，二是炭化的藜属植物种子，三是一对小麦粒和一粒大麦粒。根据碳十四测年的数据，EGS486聚落址的年代为距今2040-1820年，正值两汉时期。（Trigg H.,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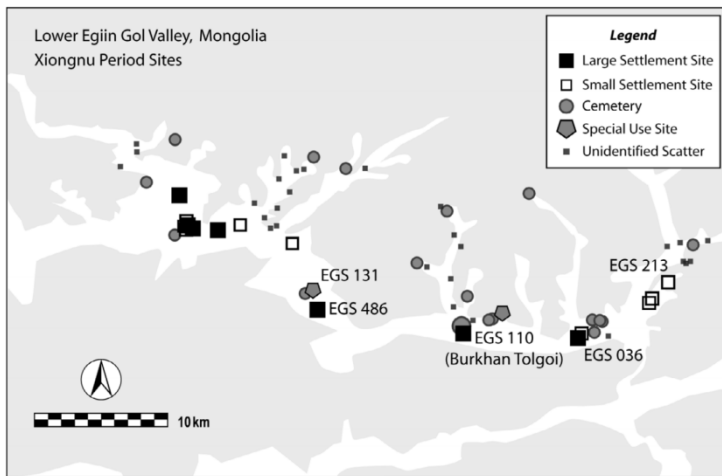


图8：下额金河谷匈奴遗址群分布图

来源：Wright, J., Honeychurch, W. & Amartuvshin, C., 2009: 374

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

俄罗斯联邦外贝加尔地区有关匈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来自于伊沃尔加古城城址，该城址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乌兰乌德（Ulan-Ude）市西南16公里处，是匈奴活动区域的最北端，“城现存南北长248米，北墙现存长194米，南墙现存长216米。城内较平整。西部和西北部略高”。（潘玲 2007：14）古城东、南、西三面围以4道土墙，每道土墙内侧都有壕沟，城内发现了80多处半地穴式的房屋（图9），砖坯构建，外用泥土涂抹，屋内东北角有火灶坑及木板铺位，门在南墙偏东南处，城中心有疑似首领居住的一处地面建筑，城内还有手工作坊，出土了大量农耕用具、粮食和家畜骨骼，陶器上还发现了汉字。这些均显示了这里的居民过着定居的农牧生活，此处或为北迁汉族人和匈奴人共同居住的区域。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伊沃尔加古城内房屋的平面基本都呈矩形，半地穴式，规模为中型，呈密集分布状。房屋的分间情况非常明显，不同的房间由众多纵横交错的沟渠分隔开来，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房屋群。房屋的布局基本一致，房内出土遗物的种类、数量和制作水平也都基本相同，显然当时居住于此的匈奴人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令人疑惑的是，古城内并没有发掘出砖瓦等建筑构件，故不清楚房址的上半部分如何建造。不过，古城内却发现了大量骨器和尚未制成品的骨料，还发现了大量的铁犁、铁锛、铁镢、铁镰刀等铁制农具及用于冶炼这些铁器的原材料（图10）。其中，铁镢的器身为长方形，有矩形的銎孔；铁镰刀的截面呈长三角形，长16-21.5厘米；铁犁有梯形銎孔，犁身两面有三角形穿孔，长11厘米，宽8厘米。（潘玲 2007：32）另外还有骨铲和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对于这些耕作工具的作用，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荣指出：“匈奴人从事耕种并把谷物当作食品，不仅见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中国文献，而且现在还能获得他们耕种时使用的农具”。（林幹2007：272）这些铁农具均出土于房屋的居住面和房内的窖穴中。伊沃尔加古城房址之间的空地和房址内存在着大

量的窖穴，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当时居住于伊沃尔加古城内的先民应当都是过着定居生活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地位基本相同，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还有一点可以做出推论的是，伊沃尔加古城内的居民应当都是有计划地迁入城中的。（潘玲 2007：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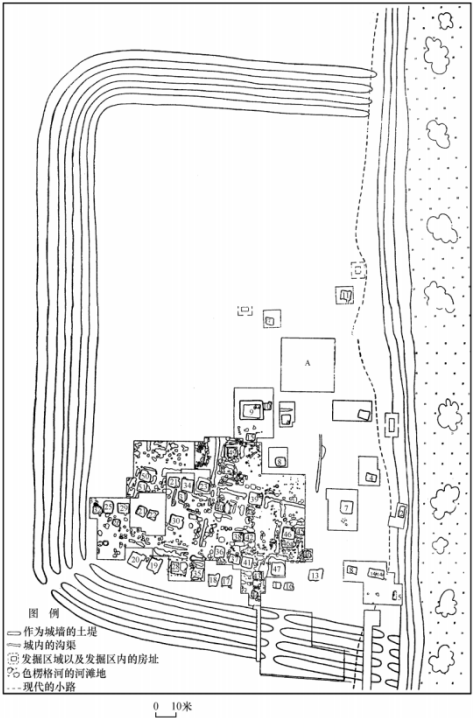


图9：伊沃尔加城址平面图

来源：潘玲，2007：16



图10：伊沃尔加城址出土铁农具（1-3.鏊 4.锄 5-6. 镰刀 7.犁 8-10.刀）

来源：潘玲，2007：33

另外，伊沃尔加古城北的墓葬中还发现有大量的家畜骨骼，动物种类主要为有绵羊、山羊、牛、猪、狗等，最常见的是绵羊的胸部或尾部，也有其他的部位，其中，狗骨占29%，绵羊骨占22%，牛骨占17%，猪骨占15%，马骨占12%，另有4%的山羊骨、1%的骆驼骨和牦牛骨。发掘者认为这些动物骨骼最初应该是作为肉类食品随葬的，它们或者和陶器一起放在头箱里，或者放在在死者头部的旁侧。遗留下来的骨骼主要为肩胛骨、肋骨、胫骨或股骨，其他部位的很少。（潘玲 2007：51）通常而言，“家畜的饲养与谷物的种植直接相关”，（刘莉 2008：127）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沃尔加古城墓葬中出土数量如此丰富的家畜骨骼，也充分说明了其农业发展的水平。

1928-1929年德别茨发掘了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Buryatia）恰克图（Khyakhta）东35公里处的都列尼遗址，这是目前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的一处重要定居遗存。共发掘了3处房址，目前已发掘了6座房屋和大约628座窖穴灰坑和柱洞，房址结构与伊沃尔加相似，出土了26件与伊沃尔加城址相似的铁犁铧，以及炼铁遗留下的残矿渣和半成品的铁块，表明当地居民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策·图尔巴图、特尔巴依尔 2015：188）

三、匈奴谷物遗存的相关问题

尽管上述诺音乌拉墓地发现的作物种子遗存和高勒毛都墓地发现的谷物遗存实证了匈奴生业形态中的确存在以谷物种植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但围绕着这些谷物遗存依然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

（一）匈奴谷物遗存的用途

对于匈奴遗存中的这些“粟”和“黍稷”，有学者认为其用途除了备荒之外，“作为战马饲料的可能性也很大”。（刘壮壮 2023：101）笔者以为，这个观点颇值得商榷。

首先，随着历史的发展，匈奴人尤其是上层纷纷开始修建城镇，过起了定居生活，而这种生活是需要以充足的粮食供应为前提的，正如蒙古国匈奴城址研究工作的奠基人X.普尔莱所指出的，“（汉文）文献中还记载了来匈奴的汉代使者在当地耕种农作物，建造储藏粮食的粮库等信息，这是匈奴建造城池的一个条件”。（策·图尔巴图、特尔巴依尔2015：187）

考古工作者在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发现、发掘了20余处匈奴古城遗址，这些城址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规模较小，城内有建筑基址，大型建筑居中，小型基址分布在周围，居民房屋为半地穴式，砖木结构。（马利清 2013：136）这类城址的代表就是位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乌兰乌德市西南16公里的伊沃尔加古城，“城现存南北长248米，北墙现存长194米，南墙现存长216米。城内较平整。西部和西北部略高”，（潘玲 2007：14）东、南、西三面围以4道土墙，每道土墙内侧都有壕沟，城内发现了80多处半地穴式的房屋，砖坯构建，外用泥土涂抹，屋内东北角有火灶坑及木板铺位，门在南墙偏东南处，城中心有疑似首领居住的一处地面建筑，城内还有手工作坊，出土了

大量农耕用具、粮食和家畜骨骼，陶器上还发现了汉字。这些均显示了这里的居民过着定居的农牧生活，此处或为北迁汉族人和匈奴人共同居住的区域。（林幹，1983：420；陈绍棣 1989：262；马利清 2005：92-94）

由此而言，笔者认为匈奴境内的粮食生产主要还是为了食用，尤其是在大寒、疾病等灾害发生时，以弥补“游牧经济之脆弱性”。（王文涛 2012：73）如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南匈奴所居住的地域爆发了一场大蝗灾，农业歉收导致三万多匈奴人面临饥荒之厄，在这种情况下，南匈奴的湖斜尸逐侯鞬单于紧急向东汉政府求救，汉章帝最终决定对匈奴人进行了赈济。而之所以选择粟和黍，是因为“粟在五谷中最耐贮藏，而被匈奴看重。相比起粟，黍的产粮虽然较低，但抗寒性更强，更适宜在漠北苦寒之地种植”。（蓝万里 2015：256）

其次，据《汉书·匈奴传下》载：“既罢，（汉哀帝——引者注）遣中郎将韩况送单于。……况等乏食，单于乃给其粮”。（班固1962：3817）虽然无法确定单于赐给韩况的粮食的来源，但却并非无迹可寻。此事发生于汉哀帝时乌珠留若鞬单于来朝的背景之下，众所周知，汉元帝时南匈奴已经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款塞”内附，至此时已近30年，匈奴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早已浸淫中原农耕文化，尤其是居住于缘边八郡的南匈奴，这些匈奴人在与朔方等缘边八郡汉人杂居的过程中，生活方式上已经汉化，加之定居所带来的大人口大幅度增加，倒逼匈奴人必须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才能养活众多的人口。

（二）匈奴谷物遗存的种植者

对于上述谷物遗存，目前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均非匈奴人所种植，而是由匈奴掳掠的“汉帝国西北边地汉人之为之”。（林幹1983：421；陈绍棣1989：262；马利清 2005：92-94）对此，笔者以为有失偏颇。

首先，匈奴人中也有熟悉农业种植者，如有学者指出的：“蒙古草原部分边缘地区在游牧化之前也曾有原始农业存在，这些农业传统似乎从未完全消失过。”（Di Cosmo，1994）这些原有农业传统的地区后来均成为重要的匈奴农业产区。尤其是在呼韩邪单于率部众“款塞”内附后居住于缘边八郡的南匈奴，吕思勉先生说：“《晋书·北狄传》载‘呼韩邪单于失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所郡县，使宰牧之，有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此等招怀宽典，不责之以输将，非其人不习农事也。其众即至千万落，沿边虽云土满，不得尽为牧场，非力耕何以自存乎？”（吕思勉1983：47）吕先生引用《晋书·北狄传》的相关记载，意在说明匈奴自呼韩邪单于率众附塞之后，这些匈奴人在与朔方等缘边八郡汉人杂居的过程中，生活方式上已经汉化，加之定居所带来的大人口大幅度增加，倒逼匈奴人必须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才能养活众多的人口。

其次，据文献记载，匈奴还在其边境地区进行屯田。《汉书·常惠传》载：“是时（汉昭帝本始二年——引者注），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救之！’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班固 1962：3003）该条史料讲的是公元前72年乌孙公主（即著名的解忧公主，乌孙人）向汉昭帝汇报匈

奴在车师国屯田的事情，匈奴之所以要屯田，是在为进攻乌孙做准备。《汉书·西域传》亦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班固1962：3922）匈奴最初的屯田企图被发现后，遭到汉朝军队的攻击，以失败告终。不甘心的匈奴在汉昭帝时再次企图在车师屯田，又被汉宣帝击退。又《汉书·匈奴传上》载：“其明年（汉宣帝地节三年——引者注），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其明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班固1962：3788）这则史料讲的是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在车师遭到失败后的匈奴为向乌孙和西域报仇而在右地屯田的事情。众所周知，屯田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一项工程，故历代多为军屯，即由军队进行屯田，由此可知，当时的匈奴中显然已经有了大量能够从事农业种植的人员，否则不可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屯田。

结 语

匈奴虽然是最为典型的游牧民族，但却始终较为重视谷物的种植，这既是其原始农业传统的延续，也是与农耕人群交往和交融的结果。

一、无论是蒙古国多处匈奴墓葬中出土的谷物种子，还是俄罗斯伊沃尔加古城及墓葬中出土的铁制农具和家畜骨骼，都是匈奴广泛进行谷物种植的实物证据，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匈奴农业发展的较高水平。

二、匈奴墓葬中以谷物随葬的方式，是受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模式的农业人群影响的结果，这充分体现了匈奴与其“势力范围的周边各种不同形态的定居或半定居农业人群”的交往和交融（王明珂 2018：171）。

参考文献

- 陈绍棣，1989，〈匈奴社会物质生活初探〉，《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页260-266。
- （德）弗雷德里希·恩格斯，200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东汉）班固，196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 蓝万里，2015，〈高勒毛都2号墓地M189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编，《高勒毛都2号墓地：2017-2019中蒙联合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
- 林幹，1983，〈匈奴的城镇和庙宇〉，见《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
- 林幹，1988，〈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的我见〉，《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页1-13。
- 林幹，2007，《匈奴史·附录一史事和资料》，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刘莉，2008，〈中国史前的碾磨石器、坚果采集、定居及农业起源〉，载《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
- 刘壮壮，2023，〈汉唐间北方游牧社会中的农耕邑居及其社会演进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页99-111。
- 吕思勉，1983，《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

- 马利清, 2002, 〈匈奴的城塞及相关问题〉,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第4期, 页49-52。
- 马利清, 2005, 《原匈奴、匈奴: 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马利清, 2013, 〈关于匈奴城址功能的探索〉, 《中州学刊》, 第1期, 页132-139。
- (蒙古)策·图尔巴图、特尔巴依尔, 2015, 〈蒙古地区匈奴城址研究〉, 魏坚、吕学明主编, 《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潘玲, 2006, 〈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匈奴墓地的等级差别〉, 《内蒙古文物考古》, 第2期, 页61-70。
- 潘玲, 2007,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王海, 2014, 〈论匈奴社会中的定居因子〉, 《河北学刊》, 第1期, 页70-74。
- 王明珂, 2018, 《游牧者的抉择: 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文涛, 2012,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社会科学战线》, 第7期, 页72-78。
- 王兴锋, 2021, 〈蒙古高原的汉代城居与匈奴的游牧生活方式〉,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2辑, 页15-20。
- 乌恩, 1990, 〈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考古学报》, 第4期, 页409-437。
- (西汉)司马迁, 1959,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 Andre Guilhem, Desroches Jean-Paul. 2002. Une tombe princière Xiongnu a Gol Mod, Mongolie (campagnes de fouilles 2000-2001). *Arts asiatiques*, 194-205.
- Bourret S., Steffen A. 2007. La naissance d'un heritage. In Mongolie, les Xiongnu de l'Arkhangai. *Muse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90-91.
- Davydova, A.V. 1968. The Ivolga Gorodisheche: A Monument of the Hiung-Nu Culture in the Trans-Baikal Region. *Acta Archaeologica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0.
- Di Cosmo, N. 1994.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092-1126.
- Hayashi, Toshio. 1983. Agriculture and fixed settlements of the Xiongnu. *Society and culture of Inner Asia and the Ancient World*, 8: 3-31.
- Korolyuk E. A., Polosmak N. V. 2010. Plant remains from Noin Ula burial mounds 20 and 31 (Northern Mongolia).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8: 57-63.
- Ligang Zhou, Enkhbayar Mijiddorj, Diimaajav Erdenebaatar, Wanli Lan, Bin Liu, Tumur-Ochir Iderkhantai, Sodnom Ulziibayar, Baatar Galbadrakh. 2022. Diet of the Chanyu and his people: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the human remains from Xiongnu burials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Mongo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32: 878-888.
- Nicola Di Cosmo. 1994.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4.
- N.V. Polosmak, E.S. Bogdanov, D. Tseveendorj, and N. Erdene-Ochir. 2008. The Burial Construction of Noin Ula Mound 20, Mongolia,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4: 77-87.
- N.V. Polosmak, E.S. Bogdanov, and D. Tseveendorj. 2013. The Suzukteh Mound 22, Mongolia: The Burial Rite.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41, 102-118.
- Robert N. Spengler III. 2015. Agriculture in the Central Asian Bronze Age.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8: 3.
- Trigg H. 2003. Report on flotation and wood samples from Mongolia. Unpublished Preliminary Report.
- Wright, J., Honeychurch, W. & Amartuvshin, C. 2009. The Xiongnu settlements of Egiin Gol, Mongolia. *Antiquity*, 83: 372-387.